

创新资讯

CHUANGXINZIXUN

2021年第7期(总第69期)

2021年7月5日

刊号 CN41-0846/(G)

黄河科技大学报特刊

主办 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

河南新经济研究院

●新探索 ●新经验 ●新观点 ●新建议

“七普”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研讨会发言摘要(下)

●本期导读

2021年6月26日,“七普”人口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办。此次会议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为背景,由河南省高校智库联盟、黄河科技学院、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来自河南省教育厅、省统计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政府研究室、省委党校、省社科院、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等政府部门以及河南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财政金融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人口之“变”。

研讨会由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主持,河南省教育厅社语处调研员、省高校智库联盟政治指导员魏军致辞。河南省统计局副局长赵德友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分析了低生育率的原因、影响,针对总和生育率低、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等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

现将有关专家的发言呈现于后,以飨读者。

河南人口红利现状及人力资本优势培育·····	梁丹	2
提高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塑造家庭友好型社会·····	行红芳	5
从“七普”看中部地区人口发展趋势·····	武文超	9
从人口数据变化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豆晓利	13
农村人口变化对乡村振兴河南实践的影响·····	高昕	19

河南人口红利现状及人力资本优势培育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 梁丹

近年来“招工难”现象开始在河南出现，人口红利水平明显削弱。怎样看待河南目前的人口红利现状，同时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尽快培育河南的人力资本优势，是一个重要的、急迫的研究课题。希望借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提高分析问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一、多角度认识现阶段河南的人口红利状况

（一）总体看依然保有明显的人口红利优势

1.过去十年河南人口持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相关数据，河南省常住人口共9936.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04%。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的9402.4万人相比，增加534.2万人（人口增加数量在全国25个人口增加的省份中排第5位），增长5.68%，年平均增长率为0.55%，略高于全国总人口10年间增长5.38%和年平均增长0.53%的水平。

2.河南继续保持明显的人口规模优势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相关数据，河南常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三位，分别比广东和山东少2664.8万人和216.2万人。加入人口流动因素，2020年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1610.09万人，流出人口占省内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16.2%，远高于全国范围内省外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8.6%的比例。从流向看，主要是流向东南沿海一带，62.4%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分别为277.36万人、246.59万人、219.72万人、134.3万人和127.19万人，分别占河南流出人口的17.2%、15.3%、13.6%、8.3%和7.9%。除掉外省流入

河南的127.37万人口，河南省净流出人口达1482.72万人。如果加入流动人口因素，河南的人口规模优势实际上还是十分突出的。

（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与劳务输出大省的地位有密切关联，该指标具有动态可变性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流动也是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内容。分析劳动年龄人口状况，既要考虑省际流动，也要关注省内流动。特别是随着省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对劳动力吸引力，大规模回流也存在较大的可能性。从动态看，河南劳动年龄人口依然存在明显优势。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相关数据，河南15~59岁人口为5841.3万人，占省内常住人口的58.79%。与2010年相比，该比重下降7.49个百分点，当年全国15~59岁人口占比为63.35%。31个省份中，15~59岁人口比重在65%以上的省份有13个，在60%~65%之间的省份有15个，在60%以下的省份只有3个（河南58.79%，广西59.69%，河北59.92%）。很明显，以常住人口计算，河南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如果考虑劳动年龄人口流出省外规模较大的情况，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认识就需要进行调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净流出人口达1482.72万人，而基于流出人口的劳动功能特征，作为人口净流出大省的河南无疑也应该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净流出大省。即使按70%计算其中的劳动年龄人口，这个规模也有1038万人。另据2020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20年末，仅河南农村劳动力输出到省外务工的人员就达到1236.44万人。假如农村输出到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减少50%，那么河南15~59岁人口就可以增加618.22万人，总数达到6459.22万人，占省内常住人口的比例就会提高到65.0%。

基于环境融入成本和外出务工导致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近年来河南各级政府引导、支持的返乡务工、返乡创业已经见到明显成效，随着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劳动力吸纳能力的提升，更多的省外务工人员被吸引回省内就业、创业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政府部门强大的培训、组织、调配劳动力的能力是现有劳动力红利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组织保障

过去几年的实践证明，河南省各级政府部门组织、调配劳动力方面的能力很强，这是我们现有劳动力红利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一个重要组织保障。郑州富士康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跳槽率相对较高，因此需要不停地招工，河南各级政府配合“保外贸”“保外资”对富士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富士康也对河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去年疫情暴发后，郑州富士康春节后急需复工复产，但员工都无法到岗，最初只有400个工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的努力，仅仅用了40天，到岗员工就由400人增加到20万人。

二、河南提升人力资本优势的紧迫性及主要举措

（一）河南提升人力资本优势的紧迫性

1. 总体素质不高是河南常住人口的主要特征

总体素质不高是河南常住人口一个主要的特征。现在河南省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是11.74%，全国是15.47%，我省和全国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2. 河南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包括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需要有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人口大省的自然优势是人手多，即初级劳动力多。要形成大规模的人力资本优势，就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人口到人手，再到一般人才和顶尖人才，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我们的高质量发展也无法实现，所以培育河南的人力资本优势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二）河南提升人力资本优势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1. 完善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机制

从全省宏观层面，我们要实施“新工科建设计划”，包括河南全员技能振

兴工程在内的一些宏观部署需要很好的实施。另外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别是要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在这一方面我们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比如校企合作，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学校表面上的东西比较多，但很多方面工作还是不够到位。再一个就是推动校企合作“走出去”。河南制造业行业里面有大量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大量投资。这些企业“走出去”之后，劳动力供应也是一个问题。所以随着企业“走出去”，校企合作的模式也要“走出去”，解决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用工困难。

2.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力度

河南由于营商环境、政策，特别是薪资待遇方面的问题，不仅省内高校培养的比较热门专业的人才留不住，引进高层次人才更是面临较多的困难。从实际情况出发，目前必须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特别重视以比较合理的待遇引人、以比较合理的待遇留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规上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的工资，东部是191577元，西部是137805元，东北是134181元，中部地区是117426元，中部地区处于最低水平，河南在中部里面又是比较低的，只有103515元。因为经济发展质量不够高等原因，所以工资水平上不去，省内高校培养的人才要往东南沿海走，外面的人才要引进来也更加困难，人才缺乏又进一步影响到河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必须采取措施有效解决。

提高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塑造家庭友好型社会

——基于“七普”数据的思考

郑州轻工业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行红芳

一、保持适度新出生人口的意义

（一）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规模的新出生人口

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部分工作为机器人代替，对工人的需求量下降。

但从整个社会来说，由于机器不具备消费能力，带不来消费，整个社会仍然需要一定规模的新出生人口。只有人才能带来消费，而消费与投资、外贸一样，是经济增长的三要素之一。因此，从我国的长远发展来看，仍然需要人口结构保持在合理的水平，需要一定数量的新出生人口。

（二）新出生人口数量下降已经成为现实

从“七普”数据来看，我国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2016年和2017年，我国新出生人口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2019年新出生人口为1468万，2020年为1200万人。

从“七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的规模比较大，甚至比上一次普查年度有微弱的增长，但应注意这里受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影响。2013年11月，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但2014年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加47万，2015年又比2014年减少32万。2015年12月，中央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但2016年出生人口仅比2015年增加131万，2017年比2016年减少23万，2018年比2017年减少200万。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极低状态。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但也提示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应对。

二、生育率低下已经成为事实

1. 影响生育的内部因素：生育群体观念的变化

只要科技还没有能够完全代替生育，生育的主体必然是育龄期妇女。实际出生人口受到育龄期女性的规模和观念的影响。目前的生育主力军为80后、90后，与前述其它群体相比，他们规模相对有限。同时他们也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群体特征：他们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兄弟姐妹少。原生家庭为

城市的80后、90后往往是独生子女，其成长过程没有兄弟姐妹，他们没有体会到有兄弟姐妹的乐趣，也没有多强的愿望给自己的孩子增添兄弟姐妹；而原生家庭为农村的80后、90后，虽然多数有一个兄弟姐妹，但他们在城市中买房、育儿，已经承受到巨大的经济压力（原生家庭能够提供的支持有限），同时又处于职业的上升阶段，工作压力大，他们往往不敢生育。

2.影响生育的外部因素：过大的生育和养育压力降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

一般来说，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即有生育意愿才可能有生育行为。笔者曾经做过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更注重传宗接代（48.98%），而女性则更多地出于完成社会责任（53.92%）和出于父母和社会的压力（32.67%）。

在影响生育意愿的家庭因素中，76.5%的受访者认为家庭收入限制其生育意愿，66.5%的受访者认为生育成本限制其生育意愿；而44.5%的受访者认为，子女照料问题会影响其生育意愿。另外，家务劳动分工、家庭代际关系和原生家庭结构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如果家庭中的男性更多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事务，女性更愿意生育子女；如果家庭中亲代与子代关系更好，女性更愿意生育子女；女性有兄弟姐妹并且关系和睦的，更愿意生育多个子女。

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规模的青壮年群体，而这只能通过生育来完成。宏观层面的人口政策要产生效果需要微观层面的个人和家庭的支持。同时，生育行为也是个人和家庭决策的结果。而在生育和养育过程中，家庭需要物质、时间和照顾方面的大量付出。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刺激生育时，也往往从这几方面来进行，通过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合理分担个人和家庭在生育和养育方面的物质成本、时间成本和服务成本，使得个人和家庭愿意生育孩子。在育龄期妇女规模下降、生育意愿低迷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系统性的家庭支持政策，以提高新出生人口数量，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三、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塑造家庭友好型社会

为了促进人口结构的均衡化，促进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立足于青年群

体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动机，鼓励生育意愿，促进生育行为，解决好群众所关心的生育与养育问题，解决群众想生、敢生、能生、能育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平衡：

第一，营造尊重生育的社会环境

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相关政策，由夫妇来决定其生育子女的时间、年龄和子女数量，倡导夫妻共担生育责任的家庭文化，肯定无偿家庭劳动的价值。社区普遍配备儿童活动场所等免费设施，倡导邻里互助儿童看护模式，为隔代照料的祖辈提供服务。加强公共场所母婴友好设施的配备，减少母婴出行障碍，广泛开展“家庭友好型”城市和工作场所评比活动。

第二，男女两性之间的政策平衡

探索将产假转为带薪育儿假，鼓励育儿假在夫妻间分配，引导夫妻双方共休育儿假的制度。逐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使其覆盖到所有育龄女性，保障生育假期的福利待遇。鼓励并倡导用人单位为有家庭责任的男女职工提供弹性工作制，适当放宽女性晋升时的年龄限制。通过税收优惠、资质评定和品牌宣传等方式，鼓励用人单位创造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建立合理生育成本分担机制，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就业，优先减免职业母亲的个人所得税。

第三，各部门社会政策的平衡

围绕女性备孕、怀孕、生产和产后恢复，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优生优育服务，提高女性生育过程的满意度。提升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水平，提高适龄人群的避孕服务质量，降低不孕不育的发生。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满足群众的不孕症诊疗服务需求，尤其是高龄妇女的生育需求。加大对儿科的重视力度，减轻家庭在育幼方面的医疗负担。

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大力发展多元化、多样性、普惠性托育服务，兴建更多的平价、公立托幼机构和幼儿园，提供安全性高、可负担性强的托幼机构和幼儿园，将其费用控制在大多数家庭可以承担的范围；加大对托幼机构和幼儿园的质量管理与监督，保证托幼机构的服务质量。

在义务教育方面，加强对课外辅导机构的管理，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促进学校之间、地区之间的教育均衡。探索职业教育分流的合理时间和有效比例，降低中考压力，减轻家庭负担。

从“七普”看中部地区人口发展趋势

河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武文超

国家“七普”数据2021年5月11日公布。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为14.1178亿，相比十年前增长7206万人，十年间增长5.38%，年均增长0.53%。从数据来看，我国人口增长率在逐步下降。



图1 历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与第六次人口普查对比，31个省份中有25个省份常住人口增长，其中人口增长比较多的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从区域分布来看，相比于2010年，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占比提高，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占比下降。如果用2020年常住人口数据去和2019年的户籍人口做对比，作为人口净流出的粗略估计。中部六省全部是人口净流出，河南净流出

1500多万，是第一，安徽是1000万排第二，湖南是第六，江西第七，湖北第八，山西第十六。人口净流入的基本上都是东部发达地区，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福建、海南等，中间有一个西部的新疆，新疆的人口净流入是全国第六。

表1 2020年我国区域常住人口及占比

	2020年常住人口 (亿人)	2020年占比 (%)	比2010年增加 (%)
东部地区	5.64	39.93	2.15
中部地区	3.65	25.83	-0.79
西部地区	3.83	27.12	0.22
东北地区	0.99	6.98	-1.2

从城镇化率来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3.89%，中部所有的省都是低于全国的，其中，河南为55.43%，湖北为62.89%，湖南为58.76%，山西为62.53%，安徽为58.33%，江西为60.44%。

从男女性别比来看，中部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正常一些，全国男女性别比为105.07，中部地区只有湖北（105.83）和江西（106.62）男女性别比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可能是由于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比较多。

从年龄结构来看的话，因为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是65岁以上，抚养比的计算是用65岁以上人口除以总人口，中部地区有湖北、湖南、安徽和河北四个省是高于全国（13.5）的，河南（13.49）跟全国水平差不多，江西的抚养比要低于全国水平。河南的老龄化看着没有那么突出，但是河南未来几年可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只会越来越加剧，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医疗条件改善以后，河南平均寿命一直在提高，现在河南的预期寿命是78岁以上了。第二，生育高峰人群的影响。我们国家第一个生育高峰是1951年到1958年，第二个是

1962 年到 1976 年，1962 年生的人今年是 59，马上就进入 60 岁以上，生育高峰到 60 多岁以后肯定会加快人口老龄化。同时，第三个生育高峰是 1985 年到 1991 年，1985 年到 1991 年的人群又快过了头胎生育年龄了。老龄人口明显要上升，生育很可能要下降。所以说，河南老龄化的情况肯定越来越严重。

从人口受教育水平来看，高中以前受教育人口占比方面，中部地区的水平都不低。中部地区主要是大学以上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全国，只有一个省份不低的，是湖北。众所周知，湖北省的高校比较多，说明还是高等教育资源分配所导致的结果。

从中部六个省会对比情况来看，可以看到 2010 年到 2020 年六个省会都出现了常住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这反映出最近十年中部地区省会发展的势头很好。其中，郑州在 2010 年以 862.65 万人排第二，2020 年已经以 1260 万人规模反超了武汉，达到第一。但是，郑州市人均 GDP 仅 95258 元，在中部地区六个省会排第四，就是比太原（78303 元）和南昌（91855 元）要高，但是比武汉（126687 元）、长沙（120846 元）、合肥（107213 元）都是要低。

表2 2020年中部六市常住人口及占比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占全省 比例(%)	2010年常住 人口(万人)	2010—2020增加 人数(万人)
郑州	1260.06	12.68	862.65	397.41
武汉	1232.65	21.34	978.54	254.11
长沙	1004.79	15.12	704.41	300.38
合肥	936.99	15.35	570.25	366.74
太原	530.41	15.19	420.16	110.25
南昌	625.50	11.31	504.26	121.24

关于人口流动、空间布局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从“七普”来看，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人口净流出较多。现在中央讲以“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的原则，这是尊重自然规律。人口净流出是尊重市场规律，实际上都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体现。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都会考虑就业机会、个人发展机遇、收入水平和社会资源配套。就业机会少、待遇低、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优的地区，人口就会呈现净流出，反之，越是发达地区，越有财力和产业基础，越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就更能吸引人才流入，形成正反馈循环。因此，未来区域发展将可能出现“强者更强”的局面。我们考虑教育、医疗、文化这些公共服务建设水平，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财政支出的问题。财政支出的问题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国家打压的比较厉害，但是中央并不否定这种方式。因为搞雄安新区的过程中又成立了一个中国雄安集团，2019年，中央还专门出台了一个文件，支持全国各个高新区的融资平台上市，现在搞高新区也鼓励公司加管委会这种模式。这都说明，实际上国家并不否定搞融资平台这种模式，但是国家否定的是，你财政收入低、还不起，你还搞融资和大拆大建。那谁的财政能还得起呢？就是发达地区能还起，比如百强县第一的昆山市（县级市），产业基础好、就业机会和待遇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昆山一年的财政收入比河南绝大多数地级市还多，人家还只是县级市。可想而知，人家搞公共服务建设就有充足的财力，所以，昆山就容易形成“发展—公共服务提高—吸引人才”的正反馈循环，未来就会是人口净流入。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河南发展，还是要搞自身比较优势比较强的领域。劳动力资源多、市场大，就搞劳动密集型企业，比如说服装、鞋；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枢纽建设好，就依托航空港围绕着物流相关的行业，建设成一个全国比较重要的物流和集运平台，那制造业企业考虑人工、物流成本，就会向河南集聚；历史文化、景观旅游资源丰富，就高质量推进文旅产业发展，提升河南文化、旅游的国际影响力；装备制造、化工产业有底子和优势，技术升级和改造的同时，就围绕优势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优势。只有塑造好、利用好独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区域竞争中争先进位，老跟着别人后面跑，那很难实现赶超。

从人口数据变化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副教授 豆晓利

6月17—19日，楼阳生书记调研郑州，重点研究部署加快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他提出了七点意见，其中，他讲到，“中原要出彩，郑州首先要出重彩；河南要崛起，郑州必须成高峰。郑州市要当好‘国家队’、提升国际化，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打造国家创新高地、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家开放高地、国家人才高地，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提质进位”。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当然跟人口问题紧密关联，下面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郑州人口数据变化角度谈谈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问题。

一、郑州人口数据变化呈现几大特点

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达1260.06万，2010年郑州常住人口为862.65万，10年增加397.41万，增长46%，年均增长率3.86%。郑州人口数据变化呈现以下特点。

1. 郑州进入千万级人口城市序列，全国城市人口排名第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总共有18个，排在前十的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天津、西安、苏州和郑州。值得注意的是，郑州人口数量排名第10，超过杭州、武汉、长沙、青岛等城市。与“六普”时相比，郑州属于常住人口超千万新增的城市，其余6个分别是西安、武汉、杭州、东莞、青岛和长沙。

千万级人口城市中，9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人口全部超千万。其中，北京、上海以及重庆人口数量10年前已经突破或接近于2000万，所以这10年增速平稳。天津人口增速是最慢的，虽然10年前人口已经达到1294万人，但年平均增速只有0.69%，

10年人口只增长了93万。成都人口增速很快，10年增长689万，现在已经突破2000万，2094万人。西安增速快于郑州，年均增速4.34%，2020年常住人口达1295万人。

表1 9个国家中心城市2010—2020年人口数据变化

	城市	2020年 (万人)	2010年 (万人)	增加数量 (万人)	增长率 (%)	年均增速 (%)
1	北京	2189	1961	228	12	1.10
2	上海	2487	2302	185	8	0.80
3	广州	1868	1270	598	47	3.93
4	天津	1387	1294	93	7	0.69
5	重庆	3205	2885	320	11	1.06
6	成都	2094	1405	689	49	3.31
6	武汉	1232	978	254	26	2.34
8	郑州	1260	862	397	46	3.86
9	西安	1295	847	448	53	4.34

特别注意的是，郑州、武汉两个都是中部地区城市。大家注意到，10年间，武汉增速和总量均低于郑州，人口总量排名已经跌出全国前十。

这里还做了一个中部地区六省会城市常住人口数量对比。中部地区六省会城市中郑州人口规模最大。根据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中部六省会城市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郑州常住人口数量最多，1260万人，其次分别是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太原。从人口增量来看，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来，郑州常住人口增加数量最多，397万人，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分别是254万、300万、191万、121万、110万人。从年均增速来看，10年来，郑州常住人口年平均增速最快，3.86%，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太原分别是2.34%、3.62%、2.3%、2.18%、2.36%。

表2 中部六省会城市2010—2020年人口数据变化

序号	城市	2020年(万人)	2010年(万人)	增加数量(万人)	年均增速(%)
1	郑州	1260	862	397	3.86
2	武汉	1232	978	254	2.34
3	长沙	1004	704	300	3.62
4	合肥	936	745	191	2.30
5	南昌	625	504	121	2.18
6	太原	530	420	110	2.36

所以,从全国城市人口排名来看,郑州人口数量总量排名第10,人口增量排名第5。从9个国家中心城市排名来看,郑州人口数量总量排名第8,人口增量排名第4(成都、广州、西安、郑州),年均增速排名第3(西安、广州、郑州)。从中部六省会城市排名来看,郑州人口数量总量、增速都排名第1。

2. 郑州劳动人口规模较大,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

从9个国家中心城市常住人口中各个年龄段构成情况来看,郑州0~14岁人口占比19.05%(全国17.95%),是国家中心城市中占比最高的;郑州15~59岁人口占比68.11%(全国63.35%),高于天津、重庆、西安等城市。郑州60岁以上人口占比12.84%(全国18.7%),在国家中心城市中占比最低。说明郑州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并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市发展潜力较大。有一个《2018全国城市年轻指数》,郑州全国排名第8位。

表3 9个国家中心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年龄构成情况

序号	城市	0~14岁 (万人)/(%)	15~59岁 (万人)/(%)	60岁以上 (万人)/(%)
1	北京	259.1/11.9	1500.3/68.5	429.9/19.6
2	上海	243.63/9.8	1661.91/66.8	581.55/23.4
3	广州	259.02/13.87	1395.58/74.72	213.06/11.41
4	天津	186.81/13.47	899.52/64.87	300.27/21.66
5	重庆	509.84/15.91	1994.54/62.22	701.04/21.87
6	成都	278/13.28	143/68.74	376/17.98
6	武汉	160/13.05	859/69.72	212/17.23
8	郑州	240/19.05	858/68.11	161/12.84
9	西安	685.22/17.33	2508.56/63.46	759.12/19.2

3. 郑州高学历人口占比在国家中心城市中排名靠后

数据显示，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65万，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为28992人，2010年该数据为18945人，10年时间以该指标衡量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在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郑州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总量是最少的，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较少，低于武汉、西安。说明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来说，郑州常住人口高学历人口占比较低。

表4 9个国家中心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受教育情况

序号	城市	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万人）	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人）
1	北京	919	41980
2	上海	842	33872
3	广州	509	27300
4	天津	373	26940
5	重庆	494	15412
6	成都	535	25582
6	武汉	417	33867
8	郑州	365	28992
9	西安	401	30999

4. 郑州人口流入以省内人口流入为主

郑州从“六普”到“七普”人口流入速度增长较快，常住人口增加397万人，但是主要来自于省内其他各地市的人口流入，省外净流入人口较少。据统计，郑州10年吸引全省74%新增人口。河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河南省统计局局长陈红瑜讲到，“从全省各地流入的人口，成为郑州常住人口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

二、郑州人口发展未来趋势

从以上郑州人口数据变化我们可以看到，10年来，郑州常住人口在数量、

结构和质量方面的变化反映了郑州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也是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效的最直接的体现，也说明了郑州具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潜力和实力。关于未来郑州人口发展规划和趋势，有几种说法：2018 年 2 月出台的《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动纲要（2017—2035 年）》中提出，“2035 年，郑州常住人口规模达到 1350 万人左右”。显然，这个目标太保守了，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2025 年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2019 年编制的《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预测，到 2035 年，郑州人口将达到 1800 万人。也有专家预测，未来 10 年内，郑州城市人口还将快速集聚，城市人口数量和质量会进一步提升，继续向 2000 万人口规模阶段迈进。当然，这同时也要求郑州要不断提升城市的感召力、集聚力和吸引力。

三、从人口角度看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郑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 2035 年的远景目标：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全面形成，基本实现“两化五强”建设目标。“两化”即现代化、国际化；“五强”即创新强、枢纽强、生态强、文旅强、法治强。如何实现这个远景目标，人的因素极为重要。

1. 继续加大人才政策，提升城市集聚力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按照 2000 万的人口容量来说，还需要继续集聚人才。现在“少子化”“老龄化”是全国性趋势，各大城市都在抢人才，郑州想要吸引人才，首先在政策上要有吸引力。2020 年 9 月，郑州颁布了人才新政，也就是“黄河人才计划”，这是继 2015 年“1125 聚才计划”，2017 年“智汇郑州”人才工程之后，郑州推出的 3.0 版人才新政。从内容上看力度也是很大的，特别是针对高层次人才，在项目引进、人才资助、生活保障等方面推出“全国最优”综合政策。

但也有一些问题有待完善，比如我看到一个博士后建议，“黄河人才计划”只适用于郑州市属企业，郑州市内省属企业和省属高校博士后被排除在外。省属企业和省属高校博士后数量众多，同样生活在郑州，工作在郑州，个人所得

税缴纳地也是郑州，为郑州的发展积极贡献自己力量。以上举措会严重影响广大博士后群体在郑州工作的积极性，也会减弱郑州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2.以人为核心，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今年河南卫视出圈了，从春晚的《唐宫夜宴》，到元宵节的《芙蓉池》，到清明节的《清明奇妙游》，到端午节的《祈》，充分展示了我们河南的文化自信。为什么不温不火的河南卫视能够出圈？其中有“天时”，我们赶上了短视频最火的时代；有“地利”，河南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更重要的是“人和”，据说河南卫视的崛起，是因为内部制度创新，采取“公开选拔，能者上”，四次晚会的导演都不一样，确保了每次晚会的创新性和多元化。所以，人永远是最重要的。河南卫视能够把流失的年轻观众拉回来，河南省一样可以把流失的人才吸引回来，郑州应该更加有信心。所以，我们应以人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最大化发挥人的价值，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的文化魅力。

3.优化人口结构，提升城市“国际范儿”

人口结构包括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性别结构等多个方面。对于郑州来说，目前比较突出的有两个结构问题。一是常住人口学历结构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较低。二是人口流入结构。前面也提到，郑州的人口流入主要来自省内其他各地市的人口流入，省外流入人口占比较低（10年省外流入人口只有127.4万人），国外流入人口占比就更低了。从全省来看，河南是净流出省份，净流出人口1549万人，净流出人口数排名第一。6月19日，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义初来研究院考察指导工作，他讲了一个观点，“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1200万外出打工的人都愿意回来，把这个1200万减少到600万”。因此，郑州作为省会城市，一方面，要扭转河南人口净流出的局面，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省外人才的引进力度，真正契合“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定位。

4.从人口数量红利到素质红利的转变，提升城市经济首位度

应该说，郑州常住人口数量优势已经体现出来了。但是，2020年，郑州GDP总量只有12003亿元，占全省比重为22%。而同时期的武汉GDP总量15616亿元，占全省比重为35%；长沙GDP总量12142亿元，占全省比重为

29%；西安 GDP 总量 10200 亿元，占全省比重为 36%；成都 GDP 总量 17716 亿元，占全省比重为 36%。这说明郑州经济效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集聚而同步提高。所以，接下来要考虑如何更好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到素质红利的转变，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效能，进一步提升郑州经济首位度。

农村人口变化对乡村振兴河南实践的影响

河南中原创新发展研究院农业农村研究部部长、副教授 高昕

农村人口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见证者，也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推动者。农村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直接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

一、近年来河南农村人口的变化特征

第一，农村总体人口数量减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相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河南常住人口从 9402 万人增加到 9937 万人，累计增加 534 万人，年均增长 0.55%，其中城镇人口增加 1886 万人，乡村人口减少 1352 万人，乡村人口比重降低 16.91 个百分点。乡村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背后反映出河南城市化进程、非农化进程正在提速。

第二，农村农业从业人员减少。2009—2019 年，河南就业人口从 5949 万人增至 6562 万人，增加 10.3%。其中，城镇就业人数逐年增加，从 1067 万人增加到 2145 万人，增加 101.0%；农村就业人数逐年减少，从 4882 万人减少至 4417 万人，减少 9.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规模从 2765 万人减少到 2277 万人，占比从 46.5% 减少至 34.7%。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反映出农业产业结构正在从劳动力密集型向农业机械化方向加速发展，农业产业化转型升级正在提速。

第三，农村老龄化程度加重且城乡倒置。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 6.96%；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12.73%，其中，65 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

8.36%；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18.08%，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3.49%。这表明：进入新世纪后，河南就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城乡老龄化程度倒置是河南人口老龄化一个鲜明的特征。在城乡人口转移的作用下，由于人口迁移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具有明显选择性，迁出农村的人口大部分为农村青壮年，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镇、村60岁以上老人占比分别为10.74%、11.07%和13.87%，老人抚养比分别为14.57%、16.07%和22.00%，乡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镇老龄化程度。目前第七次人口普查虽然没有提供详细数据，但根据趋势研判，河南农村人口老龄化将显著高于城市人口老龄化。

二、河南农村人口变化对乡村振兴的不利影响

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乡村人口结构的变动对乡村地域系统内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子系统产生影响，这些乡村内部要素的变化，又对乡村地域的整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乡村人口的流动，造成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乡村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均发生变化。赖以维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村落文化、熟人社会、宗族关系被打破，乡村发展主体弱化，乡村治理结构面临解构。在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乡村地域空间受损，经济功能衰减、环境功能弱化，乡村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面临重新组合，乡村经济地理格局亟须重塑。

一是导致乡村振兴人才匮乏。农民是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农民自身的基本状况决定着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质量。然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高收入的吸引，大量的青壮劳动力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其中，文化水平较高、拥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在城镇找到稳定、收入较高工作的机会较多，一般会在城镇长期务工甚至定居在城镇，这样导致农村农业生产经营人才的流失。而留守在农村的老龄人口，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都相对较低。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村产业融合，不仅需要大量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口的聚集，还需要具有较高文化素

质的人才的聚集。老龄化程度加快的农村，人才不断流失，而由于农业比较利益较低，外部人才与资本不会自动流入，导致农村人才缺口越来越大，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是影响农村地区的产业振兴。乡村振兴要依靠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离不开高素质人才支撑。纵观世界各国各地，产业的发展、产业的集聚，首先需要人才，需要人才集聚。然而，在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中，由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技术进步较快，所需人才更多，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回报更高，因此，多数人才流向第二产业和高端的第三产业，导致农业人才的缺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种人才缺乏问题更是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将会对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更大的阻力。例如，农村老龄人口转移到城镇、第二、第三产业的可能性较低，更不用说转移到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中年劳动力人口更偏向于向低层次的第三产业转移，如家政、社区服务、小商品买卖等。此外，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会影响劳动力资源的供应，也会影响社会投资资金的供给，阻碍着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升级。

三是加剧河南城乡发展差距。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老龄化的程度严重，这会加剧城乡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人口老龄化的前提下，农民收入增长率将下降，这将会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这也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改善空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导致年轻的农业劳动力更愿意到城市就业，但这会加剧农业劳动力资源的缺乏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其次，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农村地区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增加，而现有的基础设施满足不了这个需求，这将会扩大城乡医疗保险等基础设施的差距。一方面城乡老年人口的患病率差距在慢慢缩小，但医疗服务方面的全覆盖率差距却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农村在医疗资源和医疗保障制度等方面相对匮乏，农村人口可获得的资源有限，处于劣势。最后，农村在环境建设、乡村治理方面，缺乏先进的理念，甚至不重视环境与乡村治理，或者没有能力建设环境，环境可能会变得更糟糕，这样会扩大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异。加强农村

基础设施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有力支撑,是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有力措施,是吸引高素质人才回乡发展的有效方法。

三、应对河南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工业化和城镇化依旧是未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也使得处于急速发展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要在深刻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严峻性、紧迫性、现实性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完善农村人口老龄化应对机制,从全省层面确立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整体思路和工作部署。在策略选择上,要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协同发挥外部牵引和内生动力的双重驱动作用,从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经济发展新动力、提升乡村文化功能、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进而提升治理能力的目标,最终形成可操作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乡村振兴路径。

在外部动力培育上。一是积极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在城镇化发展的大势下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减缓农村人口的外流和引导农村人口的合理流动。在城乡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农村凭借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城镇人口的回流,进而减缓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同时,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村镇格局建设,一方面有助于推动农村人口整体的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迁移至城镇地区的家庭成员也可及时与留守人员进行联系,从而避免因留守而造成的各种社会、心理等问题。二是不断培育壮大县域经济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推动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并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市、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特征。县域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包括城镇地区的发展和乡村地区的发展两部分内容。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会推动农村的青壮年人口流入城镇,但也为农村人口提供了非农就业机会和兼业经营的可能性,减缓本地人口的外流;而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则缓解农村的劳动人口外流,并可吸引外来人口的流入,提升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占比,减缓农村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通过城镇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农村地区产业的发展，构建起了县域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道路，解决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的“三流”问题。

在内部动力厚植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十四五”规划中都提到乡村养老问题，如何完善乡村养老服务、提升乡村养老配套设施建设等都是重要课题，也亟待破题。城市老人大多有经济收入来源，农村老人收入相对较低。同时，相对于城市，农村老人居住又比较分散，所以建设一些集中的养老或农村社区养老等，成本就会比较高。如何去提供一个更符合农村老年人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和居住分布情况的养老服务非常重要。为此，一是强化和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齐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短板，构建起政府、市场以及家庭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土地养老等养老形式，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二是面向新时代城乡养老需求的不断升级，依托乡村的生态环境优势发展银发产业，一方面为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托银发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减少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甚至吸引外来人口流入，提升乡村活力；三是面向农村主体老弱化的现实，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转让、土地入股、土地出租等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助推土地向各种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既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同时也通过土地资源向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的转化为农村人口的养老需求提供资金条件。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主编：喻新安 本期编审：周建光 蒋 睿

报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领导。

赠阅：各省辖市、直管县（市）、县（市、区），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校、企业。

地址：郑州市紫荆山南路666号黄河科技学院图书馆三楼 邮编：450000
电话（传真）：0371-68787369 电子邮箱：zhcfy@126.com